

實至名歸

高秋福



文化什錦

一九八九年九月，薩利姆當選為非洲統一組織（今日非洲聯盟的前身）秘書長，並在一九九四年和一九九七年兩次連任，直到二〇〇一年七月才卸任，創下擔任這個「非洲大家庭首席外交官」時間最長的紀錄。他在宣誓就職時表示：我將盡自己的最大努力，促進非洲國家的團結，協調並加強非洲國家在政治、經濟、外交和防務方面的合作。他是說到做到，在擔任這一職務的十二年中，他以高超的外交才能，巧妙地處理了非洲一些國家間存在的緊迫而又敏感的問題。《非洲報》雜誌在其離任時刊文說，非洲「令人頭痛的事情很多，但薩利姆均件件都應對得游刃有餘」。正因為如此，他獲得「非洲之子」的稱譽。同時，在他主政期間，非洲統一組織同中國的聯繫更加緊密，非洲國家同中國的關係，從政治、經濟、軍事和人文，得到迅速而全面的發展，為後來的中非合作論壇的創立和中非友好合作關係的更大發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礎。

從非統總部回到坦桑尼亞之後，薩利姆仍擔任多種國內和國際職務。但是，正如他多次所說，他用力最多的還是至今仍擔任的坦桑尼亞中國友好協會會長一職。為使中坦友好關係

不斷加強和發展，他在兩國之間組織了多種形式的經貿、文化、教育、新聞等方面的交流活動，組建了兩國友好城市的對接。他應邀參加中非合作論壇和「一帶一路」建設研討，為中國同整個非洲國家關係的發展出謀獻策。他還通過演講和撰文批駁某些西方媒體宣揚的「中國掠奪非洲資源」論和中國「在非洲製造債務陷阱」論，將這些反華論調斥之為「新老殖民主義面對中非密切合作發出的悲鳴」。他欽佩中國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各個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認為中國的強大符合非洲的利益，中國的繁榮是維護世界和平的重要保障。

半個世紀以來，薩利姆為坦桑尼亞和整個非洲同中國關係的發展做出巨大貢獻。作為中國的老朋友、好朋友，他獲中國頒發的「友誼勳章」理所應當。只因身體欠佳，他沒能親自到北京參加授勳儀式，只好指派女兒代為領取勳章。據報道，他遠在達累斯薩拉姆，心繫北京，一再表示衷心感謝中國授予他這一崇高榮譽，堅信久經考驗的中國同坦桑尼亞和整個非洲的友誼牢不可破。他滿懷深情地說，他常駐中國雖然只有九個月，但後來訪華卻有二十多次。中國將永遠留在他的心中。

（「中國友誼勳章」榮譽者薩利姆）之四，完）



如是我思

著有《哲學的故事》，以及和妻子花了半個世紀完成《文明的故事》的美國思想家威爾·杜蘭（Will Durant）說：「六十年前我什麼都知道，如今我什麼都不知道。教育就是不斷發現我們自己的無知。」

是的，一個現在七八十歲的老翁，能懂得電腦的知識嗎？會知道什麼是大數據和區塊鏈嗎？話雖如此，知道這些嶄新知識的人，只能成為專業者，在這些範疇的職業內找到工作而已。

威爾·杜蘭也說過，不要把教育視為個人為了謀生而做的準備，要把教育視為盡可能傳遞完整技術、智識、道德和藝術遺產給多數人的一種技巧，經由這些遺產，種族得以塑造不斷成長的個體，使之具備人性。

觀乎現代教育，是否脫離了讓青少年成為具備人性的終極目的？現代教育，是否太

教育的目的是什麼？

江河水

過於重視技能的知識傳播，而忽略了「全人」的目標？

我國教育思想家蔡元培，也曾提出過五育——國民教育、實利主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觀教育和美感教育的理念，但現今的教育，卻大大偏重實利主義教育，而缺少道德教育、世界觀教育和美感教育。

只有專業知識，而不知道禮儀為何物，不知大自然之美感出自何處，不知世界各有各的發展理論，這樣教育出來的青年，是「殘人」，絕非「完人」。這就是現代教育的失敗。

多年前曾看過西方有人寫過一段話，說過去的學生進入大學，是從教授那裏得到教育，如今卻是學生認為應當去教育教授。當年看到時，只是啞然失笑。現在看來，就哭笑不得，不，不但苦笑不出來，簡直就欲哭無淚了。因為一些香港的大學生，竟然以粗暴的語言來對待大學校長，誰還能苦笑得出

來？多年前也曾看過西方人寫的另一段話，說沒有受過教育但卻懂得常識，比那些受過高等教育而對常識一概不知的人，更為優秀。真的，看到那位清潔工人，被暴徒用磚塊擲中頭部而不幸身亡，一定會明白個中道理何在吧？

英國哲學家羅素說過，世界需要的，是學生追求知識，而不是知識去追求學生。但看看最近香港的每間大學，都被迫停課甚至整個學期都宣布結束，想追求知識的學生，也被連累到了。

對青年教育的失敗，就等於失去一個青年人，這話好像是被刺殺的美國前總統甘迺迪說的。香港的教育，終極的目的究竟是什麼？應該到了認真切實反思的時候了。如果再不以「全人」教育為目的，未來教出來的年輕人只會是「殘人」，令社會進一步走向「廢殘」。

從黃河鋼琴協奏曲說開來

李夢



黛西札記

本月底，香港中樂團將在香港文化中心舉辦音樂會，紀念這座香港藝文地標落成三十周年，曲目包括香港本地作曲家的若干創作，亦有這篇文章的主角——鋼琴協奏曲《黃河》。說來也巧，明年恰是《黃河》首演五十年紀念。半世紀以來，這首作品與《梁祝》小提琴協奏曲一樣，不單為中國音樂家喜愛，也不時出現在歐美交響樂團的曲目單中，成為眾人熟知的中國管弦樂經典。

《黃河》鋼琴協奏曲在洗星海創作於一九三九年的《黃河大合唱》基礎上，由殷承宗及儲望華等中國音樂家改編而成，於一九七〇年五月一日國際勞動節當晚在北京首演，李德倫指揮中央樂團演出，殷承宗本人擔任鋼琴獨奏。《黃河大合唱》原本有八個樂章，改編為鋼琴協奏曲後，沿用協奏曲常見曲式，改為四個樂章，分別命名為「黃河船夫曲」、「黃河頌」、「黃河憤」以及「保衛黃河」四個樂章，以船工於大河風浪中無畏穿行，寓意昂揚不息、拼搏奮進的民族精神。

洗星海創作《黃河大合唱》時，逢中國抗日戰爭正酣，家國情懷顯揚於曲詞間，其在彼時彼處的意義不亞於《馬賽曲》之於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巴黎民眾。五十年前面世的名鋼琴協奏曲，氣勢上更顯昂揚澎湃，尤其是最後的「保衛黃河」樂章，鋼琴以急速跑動的音階與強力和弦，與呼嘯的弦樂及銅管聲部激烈互動，不斷推高情緒，直至將全曲引入燦爛恢弘高

潮。連周恩來總理聽過此曲後都忍不住說：「洗星海復活了！」

改編《黃河大合唱》時的「留曲不留詞」，以及最末樂章穿插的《東方紅》旋律，種種都說明誕生於一九六〇年代末至一九七〇年代初的《黃河》鋼琴協奏曲是典型的時代產物，而難得的是，它並不僅僅屬於那個時代。此後數十年，不單殷承宗、石叔誠、劉詩昆、李名強和郎朗等中國知名鋼琴家頻繁演奏此曲，外國指揮、樂團以及鋼琴演奏家對於這首極富中國意蘊的作品也好奇不已：一九七三年，逢中美關係破冰期，美國費城樂團在其音樂總監奧曼迪（Eugene Ormandy）的帶領下訪問中國，在貝多芬第六交響曲之外，亦與中國鋼琴家殷承宗合作演出《黃河》。同樣是在一九七三年，另一位著名指揮家阿巴度（Claudio Abbado）與維也納愛樂樂團首度訪華，也邀請殷承宗共奏《黃河》。阿巴度那場未留下錄音，後世樂迷無緣重溫當時盛況；倒是費城樂團、奧曼迪與美國鋼琴家愛潑斯坦（Daniel Epstein）後來曾合作灌錄此曲，由RCA唱片公司於一九八六年發行，至今仍是眾多愛樂人珍藏並津津樂道的版本。

如今的音樂世界愈發多元，仍以國別將其劃分為「俄羅斯學派」、「德奧學派」或「法國學派」，恐怕已是過時的說法，只會愈發自我固限。且以《黃河》此曲為例，中國鋼琴家固然能悟得其中的澎湃、激昂與深沉，這些旋律在美國、日本與德國音樂家的詮釋下，未嘗不能彰示滄桑與宏闊，亦可憑藉演奏者自身氣質與經驗，為原曲增添意料之外的新意。如是，舊曲新彈，才能常彈常新。



▲一九七三年，鋼琴家殷承宗（右）與費城樂團音樂總監奧曼迪（左）在北京排練《黃河》鋼琴協奏曲 費城樂團圖片

域外漫筆

為什麼我們愛看過去的事物？其實很簡單：現代的東西我們能夠看到而且看得多了；未來的我們看不到，唯有昔日年代的歷史遺跡，如果還與時光同在，那就令人倍加珍惜，不妨趁雙足還能走動時趕緊去看。

有一次到印尼首都雅加達，經過六十年代的商業區小南門，看到對面街都是一些全白色舊建築，看樣子是老城區，我就跟瑞芬說，以前我想到這老城區看看，直至最近才得償所願。那天，我們由識途老馬、文友夏蘭帶領，和文友碧珍、冬珍一起出遊，想在一些老街徜徉、漫步，感受一下舊雅加達「巴達維亞」老城區的氣息。這區域靠近火車站，還有一家咖啡館。

下車後，夏蘭引領我們轉入一個大廣場，眼視一闊，一個別致的廣場馬上映入眼簾。廣場周圍，都是荷蘭時代的舊建築，包括一棟巴達維亞博物館，廣場中央似乎有在進行各色咖啡展銷；一列七彩霓虹單車整齊排開，車頭還蓋着寬沿草帽，供人租借；一群包各色頭巾的、渾身穿得密實、高貴的伊斯蘭婦女在一所建築物前輪流拍照，與舊年代的傳統打扮大不一樣了。不知誰說了一句：「這是雅加達最早的咖啡館。」抬頭一看，綠底反白色字體招牌寫着「CAFÉ BATAVIA」，頗為驚艷。印尼被荷蘭殖民統治三百五十年，雅加達舊稱就是「巴達維亞」。我少年時代讀初中的學校就叫「巴城中學」。能依然沿用舊稱的，當然資歷不淺吧。

我們先在館外合影留念，再一呼進入。方知這腳一跨，跨越的已然是新舊兩個截然不同的年代，穿梭的是現代和兩百一十四年前的時空。向少女服務員打聽得知，此咖啡館建於一八〇五年，一八五〇年還曾經作為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行政寫字樓辦公。這咖啡館歷經滄桑，幾易其主：一九九〇年一位法國人買下這家咖啡館改裝成藝術館，不到一年，又一位澳洲人看中買了下來，再度改裝成現在的咖啡館。不過，從咖啡館的布置和整館那些大幅的照片牆能看出，這澳洲人欣賞前一位業主的設計和趣味，保留了大部分館內的氣氛和風格。

咖啡館外觀不起眼，但一走進館內，一股兩百多年前的懷舊氣息就撲面而來。

巴達維亞咖啡館

東瑞



▲▲印尼雅加達巴達維亞咖啡館內部裝潢 作者供圖

館內樓下最前面是玻璃牆，光線特強，有沙發雅座，形成長方形，天花板距離地面很高。走進正館，燈光就比較暗淡，有個小舞台設置有音響和燈光設備，想必是為周末酒吧助興而設；中間有木樓梯通向二樓，一樓到二樓的牆上都是密密麻麻的照片，蔓延到樓上，蔚成大觀。樓下座位既有大圓形桌椅，也有傳統的一小圓椅配搭四張木質扶手椅子、灰色沙發。四邊牆上都掛滿了黑白照片，僅少許是彩色的。內容既有藝術照、風景照，也有偶像明星照片及荷蘭皇室成員照片。最奇特、別致的是木樓梯下方的一間迷你的洗手間，裏外的牆上也全被照片裝飾得看不到牆身，感覺牆上好像突然多了數百雙眼睛在注視着你，感覺怪怪的。大家欲站在旋轉上去的木扶手樓梯邊的最佳角度拍照，不意好幾位友族做模特兒般站在那中央拍攝了很久。不禁回想幾十年前，友族婦女大概只有替人拍照的份兒，哪像近年變成了主角，這多少也體現了她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改變吧。

照片牆連接二樓，我們拍攝了幾張合影，就逕自往二樓走上去。環視館內二樓環境和布置，馬上被那種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的皇家氣派，那種殘存不散、餘味裊裊的殖民氣息所震懾，不來一趟實在無法體驗那種氣氛。在中國內地，遺留下來最多的是廟宇，歲月久遠，動輒千年以上，連古寺院子內的古榕歷經千年風霜。我最喜歡的還是老館子、老飯店，賣的是秘傳私家菜，未吃涎已流。但北國是茶酒大國，三大飲料獨缺咖啡。巴達維亞咖啡館的創辦人物和源起詳情已久遠不可考，但其薪火承傳一定不是神話，而有其深厚的土壤支持。印尼那時的咖啡產量僅次於巴西，嗜好咖啡風氣可以說上達官貴人，下

至販夫走卒。大街小巷的流動攤車，路邊角落裏的固定小攤檔、巴刺（馬來語「市場」）裏櫥比鱗次的咖啡店，都賣着咖啡；而眼下這類面積不小的、長方形的咖啡館二樓模式，正體現了荷蘭時代流行的中上檔次的咖啡館的風情，可以與香港九龍半島酒店的茶座相媲美。

然半島堂皇優雅，有如穿渾身雪白西服的紳士；巴達維亞咖啡館簡樸流麗，像是穿了格峇雅雅荷蘭貴婦。一列排開的咖啡座，有四人枱、兩人枱、多人圓枱、長形枱，一律鋪上了白布，白布上鋪上方形綠色花紋的印尼峇迪布，周圍環繞的椅子都是純木質的，左右有扶手，座位鋪上紅色軟座墊，木質被歲月的流光磨得銜亮。看幾乎落地的長窗外，赤道灼熱的陽光正散發威力，一定比兩百年前更熱了吧。廣場上的老建築一覽無遺地排開。再看看室內，三扇式的老風扇正發出吱吱的轉動聲響，十八世紀的老吊燈依然高掛不願退出歷史舞台。我們走到兩百年前的老酒吧、坐在高腳檯上拍照，又在照片多到驚人的照片牆前拍照，朦朧間，一曲《舞伴》的音樂響起，我們看到一對紳士淑女從牆那方向翻翻起舞過來，男的燕子尾西服，四位女的膝下旋轉着蓬漲圓裙，舞姿輕盈曼妙，還頻頻回眸向我一笑，我一時看得痴醉了，定睛細辨，才發現四個女的竟然是同來的印華友友，哪裏來的十九世紀的淑女？

在兩百年前的咖啡館喝咖啡，輕的慢飲，感受兩百年前的時光流風，感覺真好，不覺時間流逝得那麼快。各國朝朝代代留下的特色遺跡都是旅遊的好風景，與文學征途上結伴而行的文友在此消磨歡聚的時光，難道不是一種恆久的美好記憶麼？



HK人與事

新界北區，指的是上水、粉嶺、沙頭角、打鼓嶺等地段。其中位於東鐵沿線的上水和與之毗連的粉嶺，又稱為石湖墟與聯和墟。這兩個墟，昔日曾是北區兩大商業中心，特別是在墟期之日，熙來攘往，人車爭路，後來，因為周圍蓋起了屋邨大廈，墟市的作用，已越來越小了。

上水石湖墟，由開墟至今已有一百三十多年的歷史。據說，以前在墟內有一條小河流經，而河水流經的一處地方（今天的郵局附近），因有巨石數塊，將河水截住蓄起，形成一個小湖，故此地便稱為石湖墟。

早期的石湖墟並不大，只有一條小街，土名「咗婆街」。咗婆街是早期石湖墟的市中心，每逢墟期，即農曆初一、初四及初七

石湖墟重生

裘琪

日，附近的農作物都集中於此買賣，熱鬧非常。而隨着年月的增長，聚居的人越來越多，石湖墟面積亦不斷擴大。

一九五五年，石湖墟發生了一場空前大災難。那一年的冬天，正值風高物燥，墟內有一間裕豐米舖，米舖後面的磨房不知何故首先起火，火勢隨之蔓延，一發不可收拾，當時石湖墟的商舖及民房幾乎全遭祝融光顧，火災過後，滿目瘡痍，慘不忍睹。福無重至，禍不單行。翌年，即一九五六年的冬天，祝融再度光臨，大部分的臨時鐵皮屋再被燒毀，石湖墟因此而元氣大傷。

這兩場大火，卻給石湖墟帶來重整墟市的機會，在鄉民的大力重建下，堅固的房子如雨後春筍，墟市又回復生機。到了一九六四年，石湖墟的重建工作終於完成，鄉民特



▲上水新豐路，又稱大馬路，整條街幾乎都是三層高的建築物 作者攝

特別為這一連兩天在墟內舉行大巡遊慶祝活動。石湖墟重建時，所有街道都重新命名，並加上一個「新」字，以此象徵新的開始。例如，舊有的大馬路改為新豐路，原來的區所街改為新康街，加建的另一條新街為新健街；此外，還有新成街、新功街、新發街、新財街等，象徵健康、成功、發財等好意頭，這些街名，一直沿用至今。